

包容性增长奏响“十二五”主旋律

王勇

10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的代表认真商讨“十二五”规划。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减缓社会矛盾,将成为此次规划的亮点,而“十二五”经济增长的“主旋律”将围绕包容性增长展开。

包容性的内涵

近年,“包容性增长”成为舆论热点。所谓包容性增长,是指一国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也即随着经济增长,政府应更关注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而所有社会成员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积极参与,也能够对经济发展成果进行“共享”。

包容性增长有着深刻内涵。从国内方面看,不能只单纯地发展经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实现经济社会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包容性增长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的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和科学增长;经济增长的同时,财富公平分配,不造成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从全球视野看,包容性增长体现在发达国家应当主动承担起全球经济增长与经济失衡的责任,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体现在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更体现在让那些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近年来,中国在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走出危机阴影、实现复苏起到了重要引领和带动作用。就多边贸易而言,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平衡贸易收支,中国曾多次派采购团赴欧美采购并签署一系列双向投资、技术合作、先进设备引进以及货物、服务贸易等商务合同和合作意向。在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帮助美国解决救

市资金难题。

包容性增长战略实施

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中国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战略任务,必须按照中央有关精神,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为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也将就“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选择正确的路径。

二是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亟待解决,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可持续,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更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任务。因此,“十二五”时期必须按照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着力解决社会建设这个短板,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是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已被国内外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实现现代化和社会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形成一个中间多、两头少的“橄榄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

构包容性最强,社会最稳定,社会能不断发展进步。为此,“十二五”时期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是尽一切努力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这种包容性增长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包括对其出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满足内陆国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措施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为其创造体面的生产性就业机会等。

五是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而且面临所谓“3F”危机(即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的形势下,达成一项全面的多哈回合贸易协议,会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有利于使经济摆脱目前困境。对此,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加快推动。而且,“十二五”时期,中国要进一步努力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的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院长教授)

元来如此

货币战 激发 A 股泡沫盛宴

肖国元

今年国庆长假之后,沪深股市放量上行,两市成交合计达到3000亿,这是久违之事。可以说A股启动了一波别样的反弹行情,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投资者也直呼看不懂。人们关心的是:反弹会如何演绎?空间有多大?有什么因素能支撑行情的后续发展?

2009年8月,上证指数见顶3478点之后,股市就一直被几个因素困扰:一是刺激政策退出;二是贸易战及内需不足引发经济二次探底;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货膨胀。由此,沪深股市进入了长达11个月的调整,直到上证指数今年7月在2319点止跌回稳。即使2319点以来股市反弹,中长线看好的人也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反弹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就此同时,与股市表现迥异的是期货市场的黄金、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以及农产品牛气冲天。黄金价格屡创新高,牛气逼人。一般认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通胀预期。就铜价而言,如果预期经济二次探底,看涨经济前景,那么未来对铜的生产性需求就看跌。因此,铜价持续上涨似乎另有隐情。而对以黄豆、玉米、小麦、棉花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来说,疯狂上涨虽然有天气导致减产预期等客观因素,但仅此显然是不充分的。

相对于股票市场,这些远离实体经济的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既源于实体经济,又高于实体经济。也就是说,它们的表现不能脱离经济,即不能摆脱经济体的吸引力而自由翱翔,而与经济的关系又不如股市那么直接、那么紧贴着经济实体。由于期货市场、股票市场与经济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机制不同,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期货市场景气度远高于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看重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来源于期货本身因供需引发的价格涨跌,也可以来源于其他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化,如因通胀而来的价格变化。股票市场受业绩以及回报预期的制约,更忠实于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的程度远小于期货市场。这样也许解释了金融危机以来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反差明显的原因。受通胀预期影响,期货市场高歌猛进;受经济前景不明朗影响,股票市场萎靡不振。

通胀源于流动性泛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采取了刺激政策,包括政府规模超前的财政投资以及史上最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起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后来慢慢演变成经济不平衡,接着再演绎为汇率之争。

可以说,早在2008年,各国实施的刺激政策就埋下了今天纷争的伏笔。不管是财政支出的扩大,还是货币政策的宽松,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引发国内的通货膨胀。但由于政策力度不同,体现在各国货币对外币的比值上,就是汇率的波动。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力度不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不平衡。2008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复苏与西方国家的踌躇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复苏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回暖,加速了西方经济走出低迷、恢复增长的步伐,但巨大的贸易逆差仍令西方人不快,尤其是政治领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借贸易不平衡而开打的汇率战。美国想乘机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改善其贸易不平衡状况,进而扩大国内就业,就是这一思路的反映。不过,这样的思路能否为别人接受并进而依此调整政策举措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预期效果,是有疑问的。

第一,关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诊断缺乏理论依据,难以服人;第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前车之鉴让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即使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货币战开打了,也只能是隔岸叫阵,表面上风风火火,实际效果不会太明显。不过,这样一来,会产生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即各国在势均力敌、互不买账的背景下,重新着力于国内政策,挖掘内部潜力,以提振经济。

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不会像人们早前预期的那样早退出,反而会推迟,乃至变本加厉,而加息以阻止通胀的重武器也不会使用,各国会被迫自扫门前雪。各国暗中较劲,选择继续实施宽松量化政策以增加流动性,从而达到刺激经济、使本币贬值的双重目的。因此,通胀是未来经济中的常客,世界经济将陷入普遍而高企的通胀漩涡中而难以自拔。由此,期货市场已经显山露水,股票市场会紧跟其后。

就我国情况而言,在外贸出口不畅的情况下,国内的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因此,财政政策的支持不可或缺,过早收缩规模,以致完全退出并不可取。同时,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我国也不会贸然加息。否则,就是自投罗网,作茧自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因此,市场早前非常担心的流动性萎缩是一个庸人自忧的命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央行会采取一些紧缩举动,比如小幅提高准备金率、增加央票发行等。但这大多是姿态展示,做做样子而已,并不会动真格。

就我国而言,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轰轰烈烈的房地产调控将使得投资房地产的热钱大规模迁徙到其他市场。众所周知,近两年来,普洱茶、珠宝玉石、辣椒大蒜等无所不炒。相对而言,只有股票市场还称得上是半开垦的处女地,尚有挖掘价值。尤其是估值偏低,被冷落的多时的大盘股,更显得物有所值。

总之,原来制约市场的因素并不会按照常规逻辑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压抑股市。相反,这些因素因为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战而退守而偃旗息鼓,转变为刺激市场的因素。因此,股市的强劲虽有风险,但确实会带来获利的好机会。

焦点评论



赵乃育/图

财经漫画

转战股市

实话实说

“十二五”要让居民收入跑赢 GDP

冯海宁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近日告诉记者,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

居民收入增长写入“十二五”规划,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这不但影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红色警戒线。

在我看来,要实现收入增长,不但要有清晰量化的目标任务,而且要有奖惩制度作为保障;尤其要把居民收入增长纳入各级官员绩效考核表,改变今天的唯GDP主义;甚至有必要以收入分配考核取代GDP考核,不如此,不足以缩小社会收入分配这道裂痕。

当前,尽管有的地方已将城乡居民收入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但所占比重并不高;尽管有的地方把居民收入作为评估GDP数据质量的一个方面,不过依然信奉的是GDP。工资增长幅度、劳动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增长比率(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个可量化的指标,并没有真正成为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因此,应将居民收入增长纳入考核考核,并成为强制性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居民收入成为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某些地方

为了达标可能会在统计数据中注水。因此,不但要建立科学的收入统计制度以避免“被增长”,还要鼓励各种民间研究机构进行收入调查;尤其是,必须要把民意调查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因为目前公布的各种收入统计数据,普遍遭遇民意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把居民收入增长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还不够,更高层次也要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收入不公的根源在于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分配不合理,要增加居民收入,政府首先要“割肉”,其次是企业要“割肉”,而要让政府和企业“割肉”,需要宏观层面的改革,一方面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来实现,另一方面要增加普通居民话语权。

改革多年来,社会财富分配多流向了政府和企业,普通居民真正享受的改革成果远远低于企业和政府,因此,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似乎还不是最理想的规划设计。在我看来,只有让居民收入跑赢GDP增长,才能弥补改革多年来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欠账。即使GDP增长放缓,居民收入增长也不能放缓,因为民富才能国强。

有报道称,“十二五”规划有望望定调“民富五年”。这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因为重大利益调整,要触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这场变革由于触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必然阻力重重,注定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硬仗,这既需要改革智慧,也需要改革勇气。

经济时评

中国货币政策依然宽松

汪辉

当前,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于增长回落周期中,2010年前两个季度经济的高增速在下半年难以继,于是乎,政府的宏观调控动作在各种影响经济走势的因素中愈发显得令人注目。

近期有两大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中国央行调高部分银行准备金率,并且随着9月份信贷约6000亿的规模,前三季度信贷规模超出计划,市场普遍预期后续信贷将在一定程度放缓。第二个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以主席伯南克为首的六名成员支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成为定局。

两大国的央行举动让人关心:第一,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态度是否背道而驰?第二,我国政府一直强调的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这个立场是否有所改变?

我们知道,如果我国央行和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步调相反,会带来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汇率的影响。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元有贬值压力,也就是说使人民币具有升值压力,而我国如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无疑会使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加,这将给外贸带来压力并导致热钱流入国内加速。

美国当前欲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失业率在9%左右徘徊,居高不下,这是美国政府不能忍受的;二是潜在通胀水平低于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时的“合意”水平,这是美联储所不能忍受的,因为美联储最近几年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实际名义锚的趋势在逐步加强。这就很容易理解美联储的行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降低利率提高投资水平,扩大经济总需求,以提高产出减少失

业率;另一方面,扩大货币供应量以提高潜在的通胀水平,推升资产价格。

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与美国相反,呈紧缩性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国目前采取的仍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甚至比美国更加宽松。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实际利率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我国名义基准利率高出美国联邦基准利率2个百分点之多,似乎紧缩性要强得多,但是,考察实际利率后我们会发现事实完全两样了。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在我国当前需求拉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压力渐增的情况下,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得相当高,因此实际利率处于如此低的水平,可能为负数;而美国预期通胀率则要小得多,因此其实际利率也较高。因为决定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投资行为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其名义值,因此,对实际利率的分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中美当前货币政策的差异。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国央行和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都是宽松的,这是中美当前货币政策的共同特征。我们不能从一次性地上调准备金率或信贷可能的小幅收窄而得出货币政策开始趋紧的结论。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在于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中美两国所处的通胀预期环境是不同的:我国的通胀预期渐强,而美国的物价水平则有下行压力。在央行9月底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中,在管理通胀预期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排序中,央行首次将“防通胀”提到了首位。因此,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正好体现了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中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管理的“灵活运用”。所以,通胀预期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当前中美货币政策上的细微差异。

(作者为海通证券高级分析师、博士)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到ppll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